

# 我的“浅思录”

□张继东

近年来,应省城某出版社之约,我先后为《人生百味》《浅思录》《那山那情》《在记忆里》《平凡的人生》等题写书名,因此颇有些心得,愿写下来与朋友们分享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上述几部作品集(有一部是长篇小说)的作者基本上生活在中原大地,“大平原”的风物人情、文化积淀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在他们的文字中,把生活的体悟、工作中的回顾和读书思考紧紧结合在一起。《浅思录》的作者,先后就学、工作在安阳、商丘、濮阳等地。在他的这部作品集里,写亲情、母爱的诸篇都非常生动感人,另外就是他写自己工作的经历,让人读来如同亲历。

《人生百味》这部作品集,收录了作者创作的近百篇散文,《走过》

《回忆》《过年》等篇,语言简洁洗练,富有哲理。作为代序的《愿与君共享美好人生》中,作者写道:“人啊,认识的,不认识的,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生动活泼、平淡自适”。文中还写到一个细节:2006年的某一天,作者陪深圳的几位朋友登王屋极顶天坛山。同路的一位北大中文系女生可能早晨没吃饭,爬到半山腰就撑不住了。恰好,作者背包里带了几盒点心,就递给她一包,“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吃相,一个女孩子的本真是这样”。后来,“我送了她一本散文集《走在美丽的边缘》”。回校后,这位女生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,并寄来一本自己正读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程》。“这是一位知道感恩的姑娘。”

《在记忆里》是一部诗集,分为“在记忆里”“化剑为犁”“前方没有站”三辑,作者16岁到郑州郊区的

青年农场,后招工回城,在大型国企做工会宣传工作。除写诗之外,作者还酷爱摄影,发表过数百幅摄影作品。他的诗作平实自然,意象生动,让人能读出作者具有很强的“镜头感”。

明代胡应麟认为:“文章关气运,非人力。”他举例说明:“盛唐句如‘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’;中唐句如‘风兼残雪起,河带断冰流’;晚唐句如‘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’,皆形容景物,妙绝千古,而盛、中、晚界限斩然。”

我想到的是,文学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,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,心灵的共鸣才是最重要的。

其实,无论文章或是书法,都蕴含着作者的气质、胸怀、修养,还有向真、向善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


## 家风是美好的财富



□张家鸿

在娱乐化的当下社会中,大众眼里的“名人”多半指的是经常在镜头前、舞台上抛头露面的那些公众人物。而《名人之后》这部访谈录中收录的“名人”则可归于古人口中“立德、立行、立言”的行列里,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作品、思想、理论和实践来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或读者。这是一部有地方色彩的书,书中17位文化大家均来自浙江嘉兴,嘉兴的地灵人杰自是毋庸赘言,而名人之“名”,不是过眼云烟、昙花一现的短暂之名,而是源于某些独特的精神特质。

蒋百里的四女儿蒋华在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:“放假时,他让我

们游泳、骑马;他注重我们的功课,却不看重我们的分数。”“他说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文明、守法、守规矩,我们不要太重外国的物质文明;中国人的长处是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的传统文化。”在教育子女方面,蒋百里是开阔、富有远见、中西兼收的。

丰一吟回忆父亲丰子恺的教诲时说:“爸爸一直牢记李叔同先生对他说的一句话: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。’意思是说,读书人首重人格修养,其次才是文艺。”而拥有爱给予爱,就是人格修养的一部分。丰子恺曾经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当作给子女们读的教材。“我姐姐哥哥们碰到蚂蚁搬家,不但不去伤害它们,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,请行人绕行。”

这些言语背后传递的其实是一种又一种美好的家风,传统家风对于身为家长、身为教师者的启发绝不是一时一地的。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说:“王家人受祖父的影响,都十分好学,都安于坐冷板凳。”他还说:“王家人有读书人的傲气。再恶劣的环境下,都鼓励自己不要沉沦,不做小人之事。”沈霜对父亲茅盾感受最深的是他的俭朴,“他一般外出都不带秘书,生活起居由自己料理,公家配备的厨师,他也以‘家里人口少’为由谢绝了。”王国维的硬气、茅盾的俭朴、陈省身的任其自由、穆旦的爱国情怀、张乐平的仗义、蒋百里的开明、谭其骧的刻苦勤奋,不仅仅是他们子孙后代的财富,也是今日的诸多读者可以学习借鉴的。

我们今日向这些大名鼎鼎的为人父母者学,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成为日后的名人,而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家庭教育让他们长大成人、成人自立、自立在天地之间。如若成为有口皆

碑的名人,那是意外之喜,不是最初目的。徐善曾说起父亲徐积锴未能和祖父徐志摩一样成为诗人时认为:“如果徐志摩继承了父亲的事业,那么我们就永远欣赏不到他的诗歌了。重要的是,每个人应当寻找属于自己的热情。”孙道临的女儿孙庆原说:“如果你做的事和父母的专业是一样的,可能更容易成功;但你做了不同的专业,虽然不能达到父母那么高的高度,但更能证明自己。”

名人之后不管从事哪一种职业,身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,工作成绩与个人成就如何,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,就是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。与此同时,他们多有在本职工作之余,不约而同地投入于用心整理祖上留下的文字山河,数十年如一日,几乎未敢有倦怠之日。朱希祖的孙女朱元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我希望把他们的文字整理出来,为社会作贡献。这是我的愿望。”朴实的愿望背后是多年付出的艰辛。朱希祖在北京上世纪20年代的日记只剩下几个月的内容,所以后人整理时需要在别人的日记、回忆、年谱、书信、报纸、北大校史、清华校史、辅仁校史中去寻找。真可谓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资料”。要么整理,要么编订,要么著述,方式不一,然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。张人凤为祖父张元济写传记《智民之师》,整理出版《张元济全集》,修订《张元济年谱长编》,“大概编撰700万字,写作50万字。”丰一吟写下两本回忆录《潇洒风神——我的父亲丰子恺》与《我和爸爸丰子恺》,为读者留下详实可信、具体可感的父亲丰子恺。丰子恺是漫画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,也是深爱着儿女的父亲。

名人之后通过自身努力使名人的文字出版,让它们传播于后世人间、影响世道人心,这是继承之后的发扬。年谱与全集,或可整理修订。传记,则必须是在搜集材料基础上的撰写。撰写过程就是诠释的过程。名人的后生晚辈成为名人的研究者,是一件意味深长之事。因为离得近,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因为理解得深,可以使大众读者感到亲切、觉得信服。在这些后人身上,我感到的是一种冷静和责任。冷静的是他们并不因为身为名人之后,而借先父先祖之名大肆炒作,以博得关注,捞取名和利,而是对文化传播艰难的深深担忧,心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责任心,因之而投入纷繁芜杂的研究中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家学渊源”。

“追踪名人子嗣,透过他们的目光来看先贤,同时关注‘名人之后’这个群体的成长和生活状态,关注一个个特殊的家庭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的变迁。”每个名人和名人之后的故事串联起的是一条关于时间的河流,折射出的是个人命运在大历史浪潮中的跌宕起伏、悲欣交集。因此,这本书看似写个人,写家族,实则也写民族与国家。读来不仅不可能轻盈,反而是极为厚重、坚实的。中国近代史的风起云涌不难在字里行间寻找到许多值得铭记的映象,比如张元济最为痛心的商务被炸、涵芬楼被焚烧,多少藏书、善本古籍毁于一旦。

先有名人,后有名人之后,由名人到名人之后延续成一个个名门。名门之所以成为名门,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,必有其天经地义的理由。后人或可学习,或可追念,或可遥想,均体现出深远的意义。